

离县城不远有个小山村叫王畈，我呱呱坠地后直至迈进大学校门前的一段长长岁月，就在那里缓缓度过。

老家叫王大屋，老旧的青砖泥瓦房，门口孤零零矗立着石头大门框，与“大”字沾点边。黑灰底色偶露真容的第二进大厅上雕梁画栋，也算“大”屋标配。条石砌就的正方形天井太小，成人三五步就能跨过。我家就位于天井西南角，厨房门正对天井。

家门口是剃头大叔来老屋营业的固定位置，有风有雨或太阳晒的日子才移到第二进大厅里。那里有架石磨，年中岁末是各家磨粉磨豆腐的唯一工具，剃头大叔来了，工具箱就放在石磨上。他当兵去过朝鲜，只为战友理发，没真刀真枪和敌人干过。他喜欢吹朝鲜见闻，说到朝鲜美女两眼放光，大家问为什么不带个回来？他说部队有纪律，不准士兵在当地找老婆。

父亲一出生就过继给剃头大叔的父母做儿子，我也算他嫡亲侄子。他来了，我就玩他的工具，别人不行。玩得更多的是剃须刀，用它在两条手臂上剃绒毛，等我上了初中，手臂上毛发又黑又粗又长，小伙伴们笑说像猪蹄子，弄得我很久不穿短袖衫。多年后小姑妈送了支脱发膏，一抹黑毛没了，没高兴半月又长了出来，再抹再长，几次三番，黑毛淡了，柔软了，粘在臂上也不觉得长了。这倒成了我的标志和特点，新朋友见了总会盯一眼，老朋友免不了玩笑一声。

老家春节是记忆里最快乐的时光。年夜饭有荤菜，父亲的约束尚未出口之际，我快速出击，一大块红烧肉夹到嘴里，家乡习

我有个老同事——70多岁的老郑，想不到，我居然与他成了忘年交。

十多年前，我经同学介绍，到一所乡村民办小学的教学点教书，两间教室，分别教三四年级的学生。我初来乍到，学校领导告诉我，这儿原来有两位老师，还留在这里任教的同事是在公办学校退休了几年的郑老师。他满头白发，脸上布满皱纹，不过依旧神采奕奕，一看便是饱经风霜的人。

我与老郑相处久了，渐渐地了解到他的为人。年过六旬的老郑身体硬朗，讲课声音洪亮，一有学生提问他便兴致盎然，乐此不疲，在纸上沙沙地写个不停，非要举一反三，反复演示算式，直到学生搞得一清二楚。他告诉我：“最反对学生一片沉默，这样显然是不动脑思考的现象！”“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也。我退休了还来民办学校教书就是为了发挥点余热，千万不做误人子弟的事！”

无须怀疑，老郑教书是尽力而为，可他也许是老了，一点都不威严，有的学生根本不怕他，甚至在上课时做小动作。我曾给他提建议：“适当改变一下教育方式？”可是，一个人的秉性总是很难改变的。他始终我行我素，批评学生依然轻声细语，提倡“爱的教育”。

当时，我在工作之余写了一些杂文发表在市级党报副刊上，我拿给他看了，想不到他大加赞赏，说：“你年少有为，只要继续努力，前途不可限量！”他还回忆说：“当年我读了一些书，受

藏在老屋的童年

王启林



晚霞伴归 李昊天 摄

俗年头年尾不许骂人，包括孩子，骂了晦气。我巧抓机遇，常常沾光。饭后辞年也是最向往的活动，父亲带着我、有时带着我兄弟俩，去长辈家拜望送祝福，父亲抽袋旱烟喝茶，象征性拈几粒瓜子，沾光的又是我。长房长孙辞年，瓜子花生糖果总会给一点，条件好的还会给挂鞭炮，一圈下来，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口袋装满了。弟弟如果没去，回来会分他一些难剥壳的南瓜籽，他不想要，小眼睛盯着糖果和鞭炮，怕他告状，很不情愿地掏几粒糖果拆几个爆竹给他。“哥，还

把几个。”“一个，最后一个！”我俩的声音总在讨价还价中结束。

正月初一清晨放鞭炮，是新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。我们与隔两条河、一片田畈的杨家大屋比拼放鞭炮。当年太穷，放挂千鞭是了不起的大事，一般都是放挂百子鞭。杨大屋人少心齐，年底生产队分红时总留点钱买鞭炮，条件好点的人家甚至准备了千鞭。父亲在大队跑路，算有面子的人，又爱热闹，千鞭必备。其实千鞭不足数，七八百响就算优等品。当各家户主捧着鞭炮到了大门口后，牵头主事者点上一小挂百子鞭高高抛向空中，噼噼

啪啪声传到对面，对面回敬一小挂鞭炮，迎新春放鞭炮擂台赛正式拉开序幕。主事者盯着持着竹竿的一排年轻人，上个人竹竿上只剩一两寸时才吩咐下个人点鞭。放炮仗的是臂力较强者，点一个，停顿一下，使劲向前方空中抛去，这一个炸响了再点第二个。我们人多户头多，常常比对面放得多些，坚持得时间长点。偶尔也有输的时候，输大人们脸色有点阴沉，仿佛好运真的被对方抢走了。孩子们不懂这些，眼巴巴等着放鞭炮结束，捡几个未爆炸的散炮，偶尔捡到七八个连一起的断鞭，在小伙伴面前可以炫耀五六天。

小爷爷家的小姑比我小点，长得漂亮，脸上没鼻涕，特喜欢和她玩。有次我俩把奶奶不知攒了多久鸡蛋才换回的十只小鸡，用铁皮刀全杀了，放在泔水里拔毛，奶奶心痛得泪流满面，因体弱多病没挨过打的我尝到了挨打滋味。不久，还是这个小姑，还是这把铁皮刀，我俩又把才买回来不几天的小猪脖子划开了，如果不是妈妈及时发现，差点杀死了。

那时的大别山区农历十月后，经常大雪封山，大家没活干，下棋是最好的娱乐。大爷有副象棋，会点的人天天凑对下，我八九岁，觉得好玩，看多了忍不住瞎支招。长辈就让我上，手把手指点，也不知下了多久，终于有天把几位长辈打败了，大爷一看孺子可教，经常喊我去下，听他一喊我丢了作业就跑，奶奶摇摇头：“看来不是念书的料！”

如今，老屋新盖了许多楼房，原住户搬出去大半，爷爷辈不剩几人了，可是每每站在老屋石头大门前看到的，依稀还是童年时的模样。

诗集中在一起展示。”我当即表示支持：“郑老师，好啊！那是一种文学创作的见证，是白纸黑字的成果！”时间不早，我要走时，他拿着一个红色袋子给我，说：“这是老家种的花生，可好吃了，你拿去尝尝啊！”我再三婉拒，始终拗不过他，只能却之不恭了。

后来我忙于工作，与他联系渐渐少了。说起来，我是有责任的——即便忙于养家糊口、忙于照顾新出生的孩子，也总该抽点时间去看看他吧？前几天，竟然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他女儿发的噩耗——老郑安详去世了。我不禁悲从中来，想到与老郑往日交往的点滴，竟一时不知向他女儿说些什么好。他女儿反而劝我：“人生无常，总有一些人走着走着就必须得分开了。”尽管如此，我心里还是隐隐作痛，我怀念我们的深情厚谊。

想起老郑

彭伟栋

过良好的教育，也爱好文学，只是那时候家里穷，以做衣服为职业，忙于生计，没写出什么作品。后来才半路出家教书和写诗……”他说着，脸上显露出失落的表情。正所谓造物弄人，他可能还有一些辛酸的故事没有说出口。

闲暇时，他居然拿了当地的诗词小报给我看，指着一首诗歌高兴地说：“伟栋，你看，这是我写的！”我真拜读后，感觉虽然文字技巧不高，但直抒胸臆，展现了自己的愿景。我赞扬道：“写得可以啊！学习古诗诗，意义很大。”他听了，笑逐颜开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笔耕不辍，写了一大批古诗诗，确实是老有所为。

我在那里教了一个学期，学校便取消了这个教学点，老郑毕竟资格老，被安排回了总校。可是取消了两个班级，一时之间僧多粥少，我面临失业。当时年轻，在家休息了几天后，老郑突然打了我电话，高兴地告诉我：“我向学校的领导再三推荐了你，说你是文学创作上的人才，怎能轻易辞退呢，应该珍惜人才啊！学校经过考虑，想继续聘请你，不知你的想法如何？”我瞬间被他的举动感动了——老郑真是助人为乐，我与他只

不过做了短暂的几个月同事而已，他就对我推心置腹，怎不叫人动容呢？

我在这家民办学校教了一年多，便到别的学校教书了，但与老郑时有联系，他常常来我家，告诉我近况、说古诗诗创作心得、了解我的工作等等，嘘寒问暖无微不至。我每次都想留他吃饭，可他常说：“不用客气，我要回去吃，有事从乡下出来，顺便过来喝茶就好。”说着便起身走了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每次诚心留他吃午饭，可始终拗不过他。他是不愿给别人添麻烦、不注重繁文缛节的人。其实，江湖不小，什么人都有，有的人厚脸皮，有的人脸皮薄，后者也许是在社会上更讲原则的人。

后来，我好久没见老郑，便去找他。他家是一座小楼房，但里头摆设十分简洁，除了电视冰箱等家具外，没有其他特殊摆设。我想：人简单，一切便简单。我与他见面，先是寒暄几句，接着听他介绍自己今后的古诗诗创作方向。他说话间，眼睛炯炯有神，坚定而自信，一时望向窗外。窗外的远方，徐徐下降的灿烂夕阳怀揣着金黄色的梦想。他自信地说：“我想在有生之年出一本书，将那些古诗

